

从“打酱油”到“内卷”：中国网络政治用语的“抽象化”演进历程

苏楚浩

广州商学院，广东广州，511363；

摘要：本文基于近三十年中国网络政治话语的变迁为研究对象，系统梳理了其抽象化的演进历程。研究指出，网络政治用语的抽象化是经历了从“事件具象化编码”，到“群体标签与意识形态泛化”，发展到当下“心态隐喻与概念结晶”三个清晰的阶段。本文通过历时性梳理与典型案例分析，揭示了中国网络政治话语语用功能如何从“传递隐秘信息”发展为“建构社会身份”，并最终深化为“执行情绪共鸣与叙事解构”。这一演进主线不仅反映了公众语用策略的创造性适应，更生动映射了中国互联网生态与社会心态的深刻变迁。

关键词：网络政治用语；抽象化；历史演进；语用策略；社会心态

DOI：10.64216/3080-1486.25.12.081

绪论

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深度普及，网络空间已演变为一个极具活力的社会话语场。在这一领域中，网络政治用语在过去二十余年间不断生成、传播与演变，其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便是日益显著的“抽象化”。这种话语实践具备“反常规、反规则、注重个性表达的特点”，是一种“搞抽象”式语言现象，使用者倾向于用荒诞、戏谑、非线性的方式来传递信息与情绪（李伟晗，钱伟，2025）。早期的“打酱油”、“俯卧撑”等词汇，尚是对特定公共事件的指代性编码；而近年来流行的“内卷”、“躺平”、“润”、“赢麻了”等，则已升华为概括普遍性社会心态与宏观生存困境的抽象概念。

话语实现了从“指事”到“指心”的转变，其背后是技术媒介、国家治理与社会心态三者互动。因此，作者将系统性梳理这一抽象化历程，剖析网络政治话语内在的演进逻辑与语用功能的转变，对研究中国网络社会的演进与当代民众的精神世界丰富研究视角。本文将通过历时性梳理，展示网络政治用语抽象化的演变脉络，阐释网络政治用语如何从侧面成为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“语言化石”。

1 研究理论

为了深入剖析抽象化现象，作者借助三个理论视角，作为分析各历史阶段的话语实践的理论工具。

从后结构主义视角看，语言并非简单的沟通工具，而是权力博弈的场域。网络用语的抽象化，可以被视为

一种话语权的争夺，网民通过创造性地运用语言，对主流叙事进行戏仿、反讽与解构，从而争夺对自身处境和现实的定义权（孙吉胜，2008）。这种实践深刻体现了话语、身份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。

语言游戏论视角则将网络空间视为一个遵守特定（审查）规则的“游戏”。抽象化便是玩家在熟知规则后，为求有效表达而发明的策略性“新玩法”。它体现了在严苛约束下，民间语用智慧的高度创造性。尉洪池（2013）通过比较“博弈论”与“语言游戏”论，指出后者更注重规则的社会性、实践性与动态性，这为我们分析网民与治理体系的互动提供了精妙的类比框架。

模因论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抽象用语的传播机制。一个成功的抽象词汇，便是一个强势的“语言模因”，其复制、传播与变异的过程，类似于生物进化中的“自然选择”（Dawkins, 1976）。李伟晗和钱伟（2025）从模因理论角度对抽象化语言的生成机制进行了出色的语言学剖析，指出模因的存活与变异（如“基因型/表现型传播”）直接反映了其对生态的适应度与社会心态的共鸣度。

2 抽象化演进的三阶段历程

网络政治用语的抽象化，是一个伴随互联网技术与社会环境演变而逐步深化的过程，可清晰地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。

2.1 第一阶段：事件具象化编码（1990年代末—2000年代中期）

在互联网普及初期,以BBS为代表的话语空间相对宽松,但针对敏感事件的讨论已开始受到规制。此时的网络用语创造,核心语用功能在于“传递隐秘信息”,其策略主要通过对语言哲学家格莱斯提出的“合作原则”进行有意违反,来传递“言外之意”(Grice, 1975)。此阶段的网络交流呈现出早期“次生口语”的特征,即一种在文字书写中复活了口语化、互动性并依赖于特定语境的交流方式(翟羽佳,赵英乔, 2024)。

典型的方式是“谐音借代”与“旧词新义”。例如,以“河蟹”代指“和谐”,通过违反“方式准则”(避免晦涩)来规避直接的表述风险。而“打酱油”一词,原意指代与公共事件无关的日常行为,却被赋予了对热点事件“漠不关心、回避表态”的全新“会话含义”,这违反了“关系准则”(话语要有关联)。同样,“俯卧撑”一词被引申代指“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”,官方通报中提及当事人在女孩跳水前“做俯卧撑”,网民以此表达对当时事件无从置喙、只能旁观的无奈与反讽;“躲猫猫”则被引申代指“2009年云南晋宁县看守所事件”,网民以此表达对当时公权力机关解释的强烈不信任和质疑。

此阶段的抽象化,是一种初级的、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的语用策略。网民通过这种心照不宣的共谋,与“圈内人”建立起认同。此时的抽象,是作为一种“隐语”而存在,是网络话语抗争的早期形态,可被视为普通网民在与主流话语进行抗争时所使用的一种“独门秘籍”的早期形态。

2.2 第二阶段:群体标签与意识形态泛化(2000年代末—2010年代中期)

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兴起,网络舆论场域呈现出“广场化”与“圈层化”并存的趋势,网络治理也同步收紧。此时,网络用语的功能从“指事”转向“标记身份”,其核心语用功能演进为“建构社会身份”。

“屌丝”一词的流行是典型代表。它通过自嘲式的自我贬低,建构了一个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年轻男性群体的集体身份。使用该词汇,本身就是一个寻求群体归属与情感共鸣的语用行为。与此同时,“五毛”(指代那些被认为在网络上系统性宣传官方立场、反驳负面言论的参与者)、“公知”(从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的中性含义转变为带有负面色彩的标签,指代那些被认为盲目崇拜西方价值观、脱离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)等标签则

被高度意识形态化,充当了语用学中的“身份范畴标签”,将复杂的思想光谱简化为泾渭分明的群体符号,其功能在于迅速划清“我者”与“他者”的界限,进行立场站队。

尤为精妙的是“你懂的”这一表达式。它不携带任何具体的命题信息,却高度依赖交际双方共享的语用预设。说话者预设听话者拥有共同的背景知识,从而无需明言即可完成信息的传递与立场的确认,完美地实现了“说了等于没说,没说却又说了”的交际效果。

这一阶段的用语实践,清晰地展现了话语作为“弱者抗争的武器”的政治功能(徐畅, 2013)。网络流行语为社会普通成员提供了一个进行身份表达、群体认同与意识形态博弈的符号工具。从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论角度看,网民的语言选择积极地顺应了当时的社交心理世界(寻求认同、划分敌我)和物理世界(规避日益收紧的言论管控)。

2.3 第三阶段:心态隐喻与概念结晶(2010年代末—至今)

进入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算法主导的时代,网络内容监管趋于常态化与精细化,与此同时,社会竞争压力增大,“内卷”焦虑弥漫。在此双重背景下,网络用语的抽象化达到新高,其核心语用功能进一步深化为“执行情绪共鸣与叙事解构”。

此阶段的用语已从具体行为描述,结晶为概括集体心态的抽象概念。“内卷”原为人类学术语,描述一种文化模式在达到最终形态后无法稳定或转化为新形态,反而在内部变得越来越复杂精细的现象,现被广泛用于描述一种无实质增长的恶性竞争状态;“躺平”意指主动退出或大幅降低社会竞争的生存策略,是一种“非暴力不合作”式的消极抵抗;“润”(源于英文“run”的谐音)则象征了寻求“外部出路”的离散选择。这些词汇作为强大的概念隐喻(Lakoff & Johnson, 1980),其功能不在于客观描述,而在于为一种复杂的集体性情结命名并引发广泛共鸣。

“赢麻了”是此阶段反讽言语行为的典范。它通过字面上对“胜利”的极度肯定,来表达实质上的彻底否定,公然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“质准则”(不说自知是虚假的话)。其语用目的,在于对脱离个体感知的宏大成功叙事进行戏谑性的解构,表达对官方或主流叙事的不信任和戏谑解构。

此外,多模态抽象符号的兴起,如“哈基米”(最初是日本动漫中的拟声词,现其原始语义已被掏空,成为一个纯粹的情绪符号),标志着抽象化走向了极致。其传播是一个典型的模因化过程,使用者通过分享和再创作,参与的是一种情绪共振与圈层身份表演的仪式,信息传递的功能已降至次要。这种语言实际是人类在与技术环境互动中的一种“言语行动”,是动态的、复杂的过程(郑东萍等,2024)。

在此阶段,说出“躺平”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宣言,使用“赢麻了”就是在执行一次解构行动。抽象用语本身,已成为一种具有施事力量(Austin,1962)的社交行动。它们作为强势模因,其传播依赖于在特定语言生态下所能引发的语用共鸣,反映了数字时代语言学习的动态性和交互性。

3 结论

回顾网络政治用语近三十年的变迁,一条清晰的演进主线浮现出来:其核心语用功能,从最初的“传递隐秘信息”,演进至中期的“建构社会身份”,并最终深化为如今的“执行情绪共鸣与叙事解构”。这一历程完美体现了语言使用作为一种社会适应性行为的本质。

网民在变化的政治规制、技术平台与社会心态等多重生态压力下,为了实现有效的社会交际与自我表达,不断调整并创造其语用策略。他们从早期简单地违反合作原则,到主动运用语言顺应语境进行身份管理,再到创造出具有强大施事力量和情绪感染力的抽象模因,展现了惊人的语言创造力与适应性智慧。语言不仅是描述工具,更是建构社会现实、争夺话语权的权力场域(刘永涛,2011),这一观点在我们对网络用语演进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印证。

因此,网络语言的抽象化,远不止是青年亚文化的猎奇景观。它是中国社会心态变迁的实时“晴雨表”,是公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语用智慧的集体结晶,为我们观察和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,提供了一个独特而鲜活的语言视角。从“打酱油”的旁观的无奈,到“内卷”中的主动的困境言说,这些词汇串联起的,是一部缩微版的、流淌于网络空间的中国社会心态史。这

一历程不仅展现了网络亚文化作为一种“弱者抗争的武器”在与主流话语互动中的动态发展,更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国家—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具体语言视角。

参考文献

- [1]Austin, J. L.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[M]. Clarendon Press, 1962.
- [2]Dawkins, R. The Selfish Gene[M].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6.
- [3]Grice, H. P. Logic and Conversation[M]. In P. Cole & J. L. Morgan (Eds.), Syntax and Semantics 3: Speech Acts (pp. 41-58). New York: Academic Press, 1975.
- [4]Lakoff, G., & Johnson, M. Metaphors We Live By[M]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0.
- [5]李祎晗,钱伟. “搞抽象”式语言现象探析[J]. 科技传播, 2025, 17(15): 121-127.
- [6]刘永涛. 语言与国际关系: 拓展政治分析的新视角[J]. 世界经济与政治, 2011, (7): 44-56.
- [7]孙吉胜. 话语、身份与对外政策——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[J]. 国际政治研究, 2008, (3): 41-57.
- [8]尉洪池. 博弈论与语言游戏——国际关系研究中两种游戏理论之比较[J]. 外交评论, 2013, 30(1): 126-138.
- [9]徐畅. 弱者抗争的“武器”: 解读网络流行语的话语政治实践功能——以2008-2012年网络公共事件为例[J]. 新媒体与社会, 2013(04): 127-139.
- [10]翟羽佳,赵英乔. 次生口语的学理逻辑与传播形态: 从WEB2.0到WEB3.0[J]. 现代传播(中国传媒大学学报), 2024, 46(06): 148-157.
- [11]郑东萍等. The New Ecolinguistics: Learning as Language with Digital Technologies[J]. Frontiers of Digital Education, 2024, 1(1): 109-119.